

日藏《四库全书》散本杂考

刘玉才

在日本的公私藏家中,存有不少《四库全书》的散本,仅笔者涉猎所及,就有日本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庆应义塾大学及附属斯道文库以及大仓集古馆、恭仁山庄、富冈文库等多处收藏,而且版本涉及文渊、文津、文溯、文源四阁和南三阁本。这些散本对于研究《四库全书》的纂修、缮录、复校、撤改、补遗、存毁,无疑具有重要的标本价值,尤其是作为焚烬之馀的文源阁散本,更值得倍加珍视。

一、《四库全书》的纂修、庋藏与散本的形成

《四库全书》纂修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徵求遗书,次年依据安徽学政朱筠条议,乾隆帝命于《永乐大典》中缀辑散篇成帙,并令依经史子集蒐辑遗籍,命名为《四库全书》。纪昀、陆锡熊、陆费墀等人总纂其事,倾朝野之力,历经十年之久,方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成,首部《四库全书》钞本贮藏于紫禁城文渊阁。乾隆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年,又续缮三部,分别贮藏于盛京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以上合称“内廷四阁”,亦称“北四阁”。为嘉惠江南士林,启牖后学,乾隆四十七年又下令续缮三部,分别贮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装潢庋置完毕,合称“南三阁”。“北四阁”与“南三阁”本钞写格式基本一致,均为朱丝栏端楷书写,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装祯用绢面包背装,木制函套,但是用纸、开本、钤印有所不同。“北四阁”本用开化榜纸,开本宽大,每册首页钤有各阁之印;“南三阁”本则用太史连纸,开本较小^①,每册首页钤盖“古稀天子之

^①南三阁书初缮时,主持人永瑢于乾隆47年12月20日拟定章程,分款具奏,其末条云:“伏查原奏写书格纸,改用坚白太史连,系欲与先办四分显有分别,以免牵混。今由户部取到太史连纸样,质地尚属坚緻,惟尺幅较小。臣等按将板小略为收入,将来四面裁齐,装订成书,较之先办之四分,其高矮阔狭,所差不过七八分,似亦不甚悬殊。”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705—17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宝”，末页钤盖“乾隆御览之宝”，不钤各阁之印^①。“北四阁”本主要以供内廷御览为目的，藏的意义大于用。“南三阁”本缮写的目的即为便于阅览传钞，故诸项管理规章都着眼于利用，嘉道以还，登阁阅览者不计其数，许多江南藏书家更雇请书手，从阁中抄出大量罕见秘籍，于是江南私家藏书中的善本古籍，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别：传钞四库全书本或称阁钞本。

《四库全书》纂修伊始，即有“寓禁于微”之意，各地进呈的许多书籍因所谓“违碍悖逆”而被摒弃乃至禁毁，即便经过再三磨勘收入四库的书籍，也有相当部分遭到抽毁、改易、重编，甚至再被撤出销毁。仅据今存《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统计，已经列入四库著录或存目的书籍，就有六十馀种或被删除，或遭撤毁^②。全书修成庋置完毕之后，又陆续进行了撤换、复校、补遗等项后续工作。乾隆五十二年，乾隆帝在抽阅读续缮之书时，发现李清所著《诸史异同》，语涉悖妄，本应禁毁而竟然漏网。同年驻跸山庄，偶阅文津阁书，又发现其中违碍讹谬之处尚多，遂命令原纂修校对人员复校内廷四阁全书。结果查出了大量问题，仅纪昀领衔复校的文津阁本，总计“查出眷写错落、字句偏谬各书六十一部；漏写《永乐大典》书三部，坊本抵换者一部；漏写遗书八部，缮写未全者三部，坊本抵换者四部；排架颠倒书四十六部；匣面错刻、漏刻及书签误写者共三十部”^③，几占全部著录书籍的二十分之一。其他诸阁，包括南三阁，复校的情况大体相仿。乾隆五十六、七年，根据乾隆帝的要求，纪昀、陆锡熊领衔对内廷四阁全书再次进行了复校。经历两次全面的复校之后，许多版本、钞写存在问题的书籍与违碍书籍一样遭到撤换。然而各类撤换书籍并没有全部被销毁，有许多流传了下来。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尚存有李清、周亮工等人多种著作的四库写本。至于南三阁全书，由于其中一部分早在李清著作遭禁毁之前已经发往江浙，而后续部分的复校也并不认真，因此应撤毁各书甚至并未全部撤出。如文宗阁《四库全书》，便存有《书影》、《同书》二书；文澜阁《四库全书》则存有《读画录》、《印人传》、《同书》、《书画记》四书。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四库写本《书影》，考其开本和钤印格式，显然为漏网的南三阁本^④。中国书店2005年秋季书刊资料拍卖会拍品中有钦定四库全书本宋张九成《横浦集》（存五卷）和元吴镇《梅花道人遗墨》（二卷），据其纸张、款式，可以断定是北四阁写本，其中《梅花道人遗墨》卷首书名漏抄“墨”字，大概就是因此而被撤换。此书现已为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购藏。

①参见嘉庆八年《四阁全书及续三分全书用宝情彙单》，《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386页。

②参见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

③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军机大臣阿桂等奏折引，《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2119页。

④该馆另藏有四库本《中丞集》，二书均著录为文澜阁写本。

南北七阁《四库全书》庋藏之后，在时局动荡、战乱频仍的清朝后期，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历史命运。文渊阁本因深藏宫禁，得到较好保存，1917年春逊清内务府曾进行清点，仅缺《四书大全》等九种书，共计二十三卷，随后按照文津阁本补钞齐全。1933年，因日军侵华，华北局势动荡，故宫博物院为防不测，将文渊阁《四库全书》运往上海，此后十数年，辗转播迁于重庆、南京等地，竟然保存完好，1949年运抵台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贮藏于盛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则在清末动乱中已有丢失现象。1914年，又一度运往北京，1925年始返还沈阳。经历此次转徙，阙书、阙卷现象更为严重，初步统计达16种72卷之多。1926年、1934年分别据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进行了补钞，始基本恢复原貌。1966年，文化部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移交甘肃省图书馆保管至今。文源阁《四库全书》装潢贮阁之后，乾隆每年驻跸圆明园，几乎都要憩此观书，吟咏题诗。然好景不长，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遭到野蛮焚掠，文源阁全书连同建筑本身化为灰烬。过去普遍认为文源阁全书焚毁殆尽，世间已无片纸只字。但是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精钞卷子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赫然钤有“文源阁宝”朱文方印，似乎又昭示着还有焚烬余册流传于天壤间。日本所存文源阁全书本《草庐集》、《南巡盛典》散册，更证实了这一推测。在北四阁《四库全书》中，僻处承德的文津阁全书保存最为完整，据光绪二十年（1894）的查检结果，除经部《日讲诗经解义》一书原未补入，有函无书外，其他书籍基本无阙佚现象。宣统元年（1909），清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决定将文津阁全书并避暑山庄陈设书籍拨归收藏，延至1915年正式移交，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南三阁相对于北四阁本，命运更多劫难。道光年间英兵入侵，镇江文宗阁全书已遭损毁。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入镇江、扬州，文宗、文汇两阁《四库全书》全部毁于战火，距庋藏仅五十馀年。同治初年，莫友芝奉曾国藩之命专程至镇江、扬州探访两阁全书的下落，试图寻到一些前此“借录未归”或乱后“拾诸煨烬”的遗文佚册，结果空手而返。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再次攻克杭州，文澜阁因战乱倾圮，阁书星散，幸赖乡绅丁申、丁丙兄弟收拾残编，并多方搜辑购求，文澜阁全书劫后余生，尚存八千馀册，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光绪年间，文澜阁重建，丁氏兄弟又发起大规模的补钞阁书工作，使阁书总数恢复到3396种，34769册^①。民国年间，浙江方面又进行了两次补钞，并从坊肆购回一批旧钞残本，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恢复了原貌，现藏浙江省图书馆。另外，目前在海内外的公私收藏中，还存有为数不少南三阁样式的《四库全书》原钞本，一般均援例著录为文澜阁本，然而其间会不会存有文宗阁、文汇阁的遗册呢？考虑到南三阁本开本、纸张、钤印形式无从区分，又有文源阁的事例，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①据《文澜阁志》卷下，王同《文澜阁补书记》。

二、日藏《四库全书》散本

日本公私藏书单位存藏的《四库全书》散本，即来源于前述《四库全书》纂修、复校、撤换、补遗、存藏等诸多环节的阙失。试分别举述：

《三鱼堂四书大全》，一册，清陆陇其撰，存卷首、卷一，静嘉堂文库藏。卷首钤“文渊阁宝”，开本、纸张也均与文渊阁本相同。查检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陆陇其著作达七种之多，却没有《三鱼堂四书大全》，倒是《四库全书总目》的“四书类存目”录有该书。据此可以推测，《三鱼堂四书大全》原拟收入《四库全书》，并已抄毕首份，钤盖“文渊阁宝”印，但经过馆臣磨勘，又决定撤出归入存目。《三鱼堂四书大全》是陆陇其在明胡广等奉敕撰《四书大全》基础上的删订改编本，并无多大发明，既然《四书大全》已经收入《四库全书》，陆书也确实没有再收录的必要。静嘉堂文库藏本，据长泽规矩也回忆，系他1930年从北京的私人手里购入，当时全书共十册，索价三千元，他只挑了其中最薄的首册作为标本，次年，他曾在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的案头见到其余九册，然不知下落如何^①。

《鲸背吟集》，一卷，元朱名世撰，东洋文库藏。绿色绢面包背装，扉页签条为“详校官臣刘权之，覆核官臣陆锡熊”，提要尾题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首页钤“文溯阁宝”印，末页钤“乾隆御览之宝”印，册尾签条为“总校官编修衔臣朱钤，校对官中书臣宋枋远，謄录监生臣朱上林”。根据文溯阁保管委员会1925年的统计数据，当时已阙失的十六种书中，恰有《鲸背吟集》一卷。可见东洋文库所藏该本，应是在1925年前自文溯阁《四库全书》中散出，然后流入日本，而不是日军占领东三省期间所窃取。

《草庐集》，十卷，元吴澄撰，东洋文库藏。全书共九册，其中卷一、卷二合为一册，各册厚薄不均。册首扉页签条为“详校官郎中臣徐大榕”，无覆核官。册尾签条为“总校官庶吉士臣仓圣脉”，校对官、謄录监生各册不一。提要尾题乾隆四十八年恭校上。每册首页钤“古希天子”（天头），“文源阁宝”（栏框）印，末页钤“信天主人”（天头），“圆明园宝”（栏框）印。根据开本、纸张、钤印情况看，确属文源阁《四库全书》散本。但是，《草庐集》并不见于现存各阁《四库全书》，此间另有隐情。根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的记载，各地进呈的全书底本，由于主事者管理不善，兼之营私舞弊，交付缮写时即有因残阙遗失，向坊间购买刻本，抵充原书的现象^②。乾隆五十二年，纪昀领衔复校文津阁全书，查

①长泽规矩也：《书志随想》，《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六卷第257页，汲古书院，1982年。

②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上谕：初办《四库全书》时，原任礼部侍郎陆费墀以编修为提调，继为总校，于一应收发书籍，高下其手，任意勒索，嗣因卷帙遗失，又任令謄录私买坊间之书充数，以致卷帙多有不符，既又去其档案，无可稽核，因即降旨革职。（转引自陈垣：《编纂四库全书始末》，《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

出遗漏及坊本抵换者多部,《草庐集》即在其列。据当时所列清单:“《吴文正集》谨案:此书元吴澄撰,乃浙江孙仰曾所进。原本一百卷又私录二卷,所阙者不过杂文四篇。今所写乃坊刻《草庐集》,仅五十卷。”^①纪昀复校文津阁全书的成果,成为其他各阁复校的依据,《草庐集》大概就是据此被撤换出文源阁全书,从而躲过了火焚之灾^②。

钦定《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清高晋等初编,萨载等续编,阿桂等合编,专门记述乾隆帝巡视江浙及途经直隶、山东的情形。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遵照乾隆帝的谕令,先后新编数十种书籍收入全书,《南巡盛典》即属此列。然而由于诸种原因,这些“敕撰本”并未及时完成,有些甚至延至嘉庆初年才告竣,因而造成全书七份钞成之后仍有部分空函待补的现象。根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的记录,《南巡盛典》编成于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次年始缮写颁发诸阁庋藏,嘉庆八年军机大臣庆桂等有奏折,提及《南巡盛典》早经缮毕归架,只是原定十四函,书成归架仅有七函,尚空七函。

据笔者涉猎所及,日本现有三处收藏四库本《南巡盛典》。东洋文库藏《南巡盛典》卷二十至二十二(1册),内藤湖南恭仁山庄藏卷二十八至二十九(1册),同属文源阁全书本。两册均为橙红色绢面包背原装,书框高15.2厘米,广22.3厘米,较前述文溯阁《鲸背吟集》宽大。册首扉页签条为“详校官主事臣丁培”,册尾签条为“总校官候补中书臣潘有为,校对官主事臣陈文枢”,眷录监生东洋文库本为臣胡瑛,恭仁山庄本为臣陈韶。每册首页钤“古希天子”(天头)、“文源阁宝”(栏框)印,末页钤“信天主人”(天头)、“圆明园宝”(栏框)印。应是圆明园文源阁焚烬散落之物,书皮尚存泥水污染痕迹。两册原先均为东京著名藏书家和田纊四郎收藏,有“云村文库”印记。两册之外,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属下的大仓集古馆尚存有一套完整的四库本《南巡盛典》。全书一百二十卷,四十二册,红绢书皮,包背装大本。每册首页钤“文津阁宝”印,末页钤“避暑山庄”印,与文津阁全书样式完全一致。有意思的是文津阁《四库全书》并不缺《南巡盛典》,因此就有两套文津阁全书本《南巡盛典》传世,笔者推测大仓集古馆藏本应是撤换之本,撤换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复校时发现不少错误;二是插架时为凑函数需要调整册数,于是另抄一部。因为《南巡盛典》是全书钞成庋藏之后又补入空函的,今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全书本《南巡盛典》册数厚薄不一,而大仓集古馆本四十二册厚度均一。当然这只是推测,还需要将

①《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九日纪昀奏折所附清单。据黄爱平考证,此单实为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纪昀奏折所附,即乾隆五十二年十月至五十三年正月纪昀等人复校文津阁全书的结果。见黄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7页。

②关于此本《草庐集》的详情,可以参考王瑞来:“日本东洋文库所藏《四库全书》文源阁本《草庐集》考述”,《书目季刊》1994年28卷第2号。

两本仔细比对，才能得出结论。

南三阁本 在日本的公私藏书单位里，南三阁样式的全书原钞本还存有不少，一般也是作为文澜阁本著录，但为慎重起见，我们宁愿称其为南三阁本。据长泽规矩也回忆，1930年夏他在杭州发现了一批文澜阁《四库全书》散本，且对此事颇为得意。因为此前他自北京书肆为静嘉堂文库购到一册四库全书本《嘉禾百咏》，日本国内藏书家以没有文澜阁印为由，判定其为四库底本，结果他不得不自己掏钱买下。他还曾拿在北京得到的四库本《湖山集》请教著名版本专家徐森玉等人，徐也不认为是南三阁本。而他在杭州发现的这批散本与前二书样式相同，关键是绢面书皮完整，证明确属《四库全书》原钞本。当时他为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购买了《竹屿山房杂部》（卷十四至二十二，1册），还购买了《墨客挥犀》（卷一至五，1册）送给服部宇之吉，每册仅二十元，所以后悔没有全部买下。据长泽规矩也涉猎所及，南三阁样式的四库散本，日本还有如下收藏：

静嘉堂文库陆心源旧藏 《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卷一至三（1册）；《桐山老农集》四卷（1册）；《耕学斋诗集》十二卷。

富冈文库 《六艺之一录》卷一至二（1册）

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 《通志》卷一七六（1册）；《天中记》卷四六（至69页，1册），无封皮；《梅溪后集》卷二六至二九（2册）；《宋文鉴》卷二八至三〇（1册）；《宋诗钞》卷三一至四〇（1册）。

某私人 《通鉴纪事本末》卷二五下、二六上（1册）^①。

上述之外，据笔者涉猎，尚有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春秋地名考略》卷六至八，《古史》卷二八至三一，《珞琭子赋注》卷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各一册，分属经、史、子、集四部，封皮绢面保存完好^②。庆应大学图书馆藏《周易函书别集》卷一至二（1册），该校附属斯道文库藏《周易参同契通真义》卷上下（1册），此册后半还沾有血迹，背后应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三、四库底本的散本

《四库全书》除南北七阁庋藏之外，翰林院尚存七阁缮写时依据的底本，所以实际共有八部。翰林院底本来源于纂修时徵集的大量书籍，其间部分是原书发还过录的副本，但主要还是没有发还的原书。乾隆帝原本谕令缮写一份全书贮藏翰林院，供词馆诸臣和翰林士子阅览，但是缮写七份全书，人力物力已是捉襟见肘，四库馆总裁遂建议不再另抄副本而是直接贮存底本，并得到乾隆帝的批准。于是，续缮三份全书办理完毕后，所有底本集中存放到翰林院，并依

^①长泽规矩也：《书志随想》，《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六卷第260页。

^②据《文澜阁志》记载，文澜阁本全书集部封面用黑灰色绢，而此《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封面不为黑灰，倒与《扬州画舫录》记载文汇阁全书集部绢面用藕合色接近。

照全书部类目次编排,开放供词馆诸臣和士子钞阅。翰林院贮存的四库底本,原书在四库纂修过程中,因辗转传抄、私人窃据,已经大量遗失,主事者敷衍塞责,用一些坊刻劣本抵充了事。据乾隆四十五年的清查,没有钤盖翰林院等关防印鉴的不明来源底本高达五百馀种。四库底本移交翰林院后,因为管理松弛,丢失不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占北京,又遭到抢掠损毁,至光绪十九年清点,已仅存一千馀种。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沦为战场,残存的四库底本损毁殆尽,剩余部分或横遭劫掠,或散落民间。

日本公私藏书单位收藏的四库底本数量不菲,然笔者未及进行调查,现仅就外界了解不多的大仓集古馆的收藏稍作介绍。大仓集古馆是以中日古代美术品的收藏而闻名,实际其中国古籍收藏,因为有董康诵芬室的基础,颇多珍罕之本。据其馆藏善本书目,计有宋刊7部,元刊15部,明刊175部,明清钞本107部,而这只占其古籍收藏的三分之一。其中,四库底本著录有9种,列表如下:

书名	卷数	著者	版本	进呈藏家	印记
革除编年	不分	明阙名	明蓝格钞本	范懋柱	军机处、翰林院
闽中考	1	明陈鸣鹤	明钞本	吴玉墀	军机处、翰林院
三国纪年	1	宋陈亮	明乌丝栏钞本	范懋柱	军机处、翰林院
损斋备忘录	2	明梅纯	明蓝格钞本	范懋柱	军机处、翰林院
韩集举正	22	宋方崧卿	南宋刊本	朱筠	军机处、翰林院
太史范公文集	55	宋范祖禹	清钞本	汪启淑	军机处、翰林院
欧阳修撰集	7	宋欧阳澈	影钞明万历本		翰林院
字溪集	3	宋阳枋	四库过录副本		
梅岩胡先生文集	10	宋胡次焱	明嘉靖刊本		翰林院

此外,大仓集古馆还有十馀种书钤盖有“翰林院”印记,与四库底本一样,也是翰林院的旧物。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